



少年时读鲁迅的小说,字里行间读出他对旧文化的激烈批判,心里默默给他贴上“反传统”的标签。

越长大越知道自己的无知和偏见,以为鲁迅对传统只有否定,那是极大地误解了他。

鲁迅的学问根基极深,他对古典文学、金石学、佛学、野史笔记等都有深入研究。学者孙郁在《鲁迅与国学》中指出,鲁迅的写作中暗藏了许多传统元素,比如《故事新编》对神话传说的重构,《野草》中庄子式的哲学思辨,甚至他的杂文笔法,也深受魏晋风骨的影响。大先生的深刻之处,恰恰在于他既能犀利地解剖传统的痼疾,又能从中汲取养分,形成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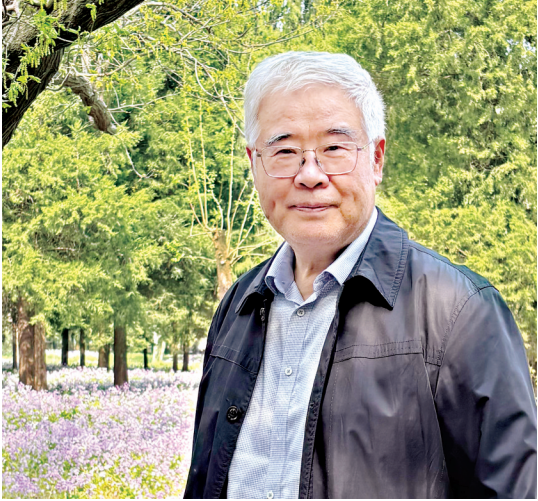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反对僵化、异化的“传统”——比如礼教吃人、比

如麻木的国民性。他撕开传统中虚伪、腐朽的部分,让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得以浮现。这样的批判,是一种“祛魅”。

现代人对传统,往往陷入两种极端:要么盲目崇拜,奉为金科玉律;要么全盘抛弃,视如敝屣。而鲁迅的态度提醒我们,传统需要辩证地扬弃——坏的,要彻底揭露;好的,要大胆继承。

鲁迅的文字、思想乃至人格,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。现代人若想真正面对传统,或许该学鲁迅——既不跪着膜拜,也不指着唾骂,而是站着思考,让传统成为我们前进的阶梯,而非沉重的包袱。

王永芳



孙郁

孙郁专著探究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深层态度 鲁迅是有“暗功夫”的人

□长江日报记者李煦

“鲁迅是一个常常被世间误解的人,在对国故的态度上,他被人批评的地方很多。”这是孙郁《鲁迅与国学》正文第一句话。

孙郁,曾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、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,《鲁迅与国学》是他最新作品。上周,长江日报《读+》周刊专访了孙郁。



《鲁迅与国学》孙郁 著 商务印书馆

鲁迅爱护中国传统文化中 有生气、有价值的部分

在《鲁迅与国学》这本书中,孙郁从功底、功绩、思想等方面探讨了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关系,涉及鲁迅对儒、道、佛三家思想的批判转化、对汉字、戏曲、野史、魏晋文学、古代小说的研究评价,直面回应了几乎所有鲁迅被人批评的地方,展示了鲁迅知识结构中隐蔽的一面,孙郁称之为“暗功夫”。

“暗功夫”是摸不到的,是虚的存在,但爆发起来,却有大的内力。他同时代一些学者和作家读过什么书,从其文章很容易看到。鲁迅不是这样,他的文字背后有一个东西支撑着,它不显现,但在无形里存在着,而且一定程度决定了词语厚度的有无。比如他和弟弟翻译《域外小说集》,用的却是六朝以前古奥的文字。

鲁迅的藏书被完整保留下来,有14000多册。从中可以发现,他的知识很驳杂,兴趣亦广。除了文学之外,金石学、考古学、科学史、文字学、哲学、美学、民俗学、心理学、历史学的著作都有,这构成他的知识谱系。

1912年8月,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金事,主要负责博物馆、图书馆、植物园、美术馆,以及调查搜集古物事项等。在为国家保护旧物方面,他做了很多事,比如建立历史博物馆、国家图书馆、举办博览会等。他亲自参与了中国首个历史博物馆的筹备,将自己所藏的铜镜、瓦当捐献给博物馆。

孙郁还提到了鲁迅在当时《教育部编篡处月刊》上发表的《拟播布美术意见书》,这里的美术其实涵盖了文化艺术、文物保护的方方面面。鲁迅主张,成立中央美术馆,保护著名建筑、名人故居、祠宇、坟墓、碑碣、壁画及造像,各地优美林野应禁绝剪伐、辟为公园。鲁迅还提出,要成立中国古乐研究会、国民术研究会,“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,辨其特性,又发挥而光大之,并以辅翼教育”。

这与今天的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”已经相去不远,鲁迅这方面的眼光超前。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真正有生气、有价值的部分,他是相当爱护、自豪,搜集了六千多张汉画像拓片。鲁迅的好友许寿裳谈到鲁迅对于汉代造像艺术的喜爱:“他曾经告诉我:汉画像的图案,美妙绝伦,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。即使是一鳞一爪,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,说日本图案如何了不得了,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汉画呢。”

但是鲁迅也认为,宋代以后的艺术是弱化的:“汉唐虽然也有边患,但魄力究竟雄大,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,或者竟毫未想到,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,就如将彼得来一样,自由驱使,绝不介怀。一到衰弊陵夷之际,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,每遇外国东西,便觉得彷彿彼来俘我一样,推拒,惶恐,退缩,逃避,抖成一团,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。”

孙郁认为,古人的学问是静态的多,鲁迅的思考是与社会和人生密切相关的,所以就没有匠气与迂腐气。鲁迅以非学院派的方式,解释了象牙塔内一些学者不能穿透的话题,其认知的深度不仅与庄子、墨子、释迦牟尼有所交叉,也与康德、海德格尔哲学构成一种呼应的关系,其精神更带有现代哲学的意味。正像尼采从古希腊文明中吸收了智慧一样,鲁迅的智慧多半来自中国古代文明的熏陶,只是他避开了儒学正宗之路,而发现了文明史中的另一种资源,也就是“取今复古,别立新宗”。

绕不开的“青年必读书”事件

讨论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,有件事是必须提及的。整整100年前,也就是1925年,《京报副刊》请名流学者推荐十本“青年必读书”。七十多位名流大咖,如梁启超、徐志摩、顾颉刚参与。

鲁迅也受邀,他的答复正文只有一句话:“青年必读书从没有留心过,所以现在说不出。”

这答案后面还有个“附注”:

但我要趁这机会,略说自己的经验,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——

我看中国书时,总觉得就沉静下去,与实人生离开;读外国书——但除了印度——时,往往就与人生接触,想做点事。

中国书虽有助人入世的话,也多是僵尸的乐观;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,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。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,多看外国书。

少看中国书,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。

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“行”,不是“言”。只要是活人,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。

少看中国书,百年前石破天惊的一句话,当时就引来很大反响,有赞成也有反对。

这里单说反对声,根据鲁迅自己的记述,“为了《青年必读书》,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,收了一大捆,至今还塞在书架下”;有学者说鲁迅“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,如今偏不让人家读,这是什么意思呢!”还有人写文章暗示他“卖

国”。

鲁迅后来也回击了几次。“有谁要读,当然随便”;“只是倘若问我的意见,就是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,多看外国书”;就好像“我”有时也喝酒,“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,我总说:你不要喝酒”。

此外,“近来很通行说青年,开口青年,闭口也是青年。但青年又怎能一概而论?有醒着的,有睡着的,有昏着的,有躺着的,有玩着的,此外还多。但是,自然也要有前进的。”既然青年不能一概而论,青年导师、青年必读书自然也不可靠。

针对“卖国”的暗示,鲁迅的回答是,“宋末、明末,送掉了国家的时候,清朝割台湾、旅顺等地的时候,我都不在场”;在中国苦难的时候,“达尔文的书还未介绍,罗素也还未来华”,而儒家经典却早就在了。

此事发生5年后,1930年,鲁迅好友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考入清华大学。许世瑛5岁时,鲁迅就是他的“启蒙先生”;此次许世瑛入中国文学系读书,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,他便开了一张书单,包括《唐诗纪事》《唐才子传》《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》《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》《历代名人年谱》《少室山房笔丛》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《世说新语》《唐摭言》《抱朴子外篇》《论衡》《今世说》等十二种。

从这两件事看,鲁迅对传统国学的态度是否有矛盾呢?让我们看看孙郁是如何分析的。

访谈

读+:能否为我们分析一下鲁迅的“青年必读书”事件和他为许世瑛开书单?

孙郁:当时的当权者“尊孔读经”,利用孔子,用儒家的那些东西搞复辟搞专制,所以“五四”知识分子要打倒孔家店,但并不是打倒孔子,是把孔子救出来。民国年间,以鲁迅为首的一些人批评旧文化,都是有特指的。比如儒学,他所指的乃被士大夫污染的儒学。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,北京有一些文人大谈儒家的经典,鲁迅就写了一篇文章叫《儒术》,举了个例子,南北朝的时候少数民族入主中原,那些儒生在干什么呢,给统治者的孩子们讲《论语》。研究儒学的人把《论语》当成了一个保命的工具。

如果用学院派的理念看,鲁迅的言论未必中正,看法偏执的地方很多。但鲁迅的出发点还在启蒙与大众解放领域,他认为新的东西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,平衡的意识可能会弱化新文化的势力,保卫新文化的成果异常重要。

鲁迅自己曾有士大夫的基因,但他要挣脱的恰是儒家的负面遗产。鲁迅提倡多读外国书,其实也是增强青年免疫力的需要。他知道国粹过

孙郁写道:仔细阅读鲁迅的手稿和整理国故的资料,会发现他的学问其实很深;和他同代的许多学者,对于其学识与思想,都是赞佩者多的;“与鲁迅思想相左右,对于其学术水准,也是不敢轻易否定的。”

孙郁认为,古人的学问是静态的多,鲁迅的思考是与社会和人生密切相关的,所以就没有匠气与迂腐气。鲁迅以非学院派的方式,解释了象牙塔内一些学者不能穿透的话题,其认知的深度不仅与庄子、墨子、释迦牟尼有所交叉,也与康德、海德格尔哲学构成一种呼应的关系,其精神更带有现代哲学的意味。正像尼采从古希腊文明中吸收了智慧一样,鲁迅的智慧多半来自中国古代文明的熏陶,只是他避开了儒学正宗之路,而发现了文明史中的另一种资源,也就是“取今复古,别立新宗”。

孙郁:年轻人经历过生活以后,他才能够慢慢和鲁迅相逢。鲁迅当时听说自己的作品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时候,他非常难过,他说我的文章是不适合年轻孩子们读的,我是有毒的。

所以一般都是中青年,生活遇到了磨难以后,才理解到鲁迅的深意,于是他们很多人开始写关于鲁迅的心得,当然现在年轻人也有不少了。

(1924年1月12日,鲁迅的朋友孙伏园在《晨报副刊》上发表《关于鲁迅先生》一文说:“鲁迅先生所以对于《呐喊》再版迟迟不准许的原因,最重要的一个是他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,竟在那儿用《呐喊》做课本。这是他极不愿意的,最不愿意的是竟有人给小孩读《狂人日记》。他说‘中国书籍虽然缺乏,给小孩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,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《呐喊》’。他说,他虽然悲观,但到今日中小学生长大了的时候,也许不至于‘吃人’了,那么这种凶险的印象给他们做什么!他说,他一听到《呐喊》在那儿给中小学生读以后,见了《呐喊》便讨厌,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,

此外,“近来很通行说青年,开口青年,闭口也是青年。但青年又怎能一概而论?有醒着的,有睡着的,有昏着的,有躺着的,有玩着的,此外还多。但是,自然也要有前进的。”既然青年不能一概而论,青年导师、青年必读书自然也不可靠。

针对“卖国”的暗示,鲁迅的回答是,“宋末、明末,送掉了国家的时候,清朝割台湾、旅顺等地的时候,我都不在场”;在中国苦难的时候,“达尔文的书还未介绍,罗素也还未来华”,而儒家经典却早就在了。

此事发生5年后,1930年,鲁迅好友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考入清华大学。许世瑛5岁时,鲁迅就是他的“启蒙先生”;此次许世瑛入中国文学系读书,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,他便开了一张书单,包括《唐诗纪事》《唐才子传》《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》《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》《历代名人年谱》《少室山房笔丛》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《世说新语》《唐摭言》《抱朴子外篇》《论衡》《今世说》等十二种。

从这两件事看,鲁迅对传统国学的态度是否有矛盾呢?让我们看看孙郁是如何分析的。

于强大,倘没有免疫力,会被旧文学里陈腐的遗存缠住,这是危险的。外国作家像莎士比亚、雨果、契诃夫、托尔斯泰,总要让读者冷静面对自己与社会的问题;而古代士大夫文字面对真问题的表述殊少,青年寻觅有意味的文字,要花费很大的精力。

此外,鲁迅对“青年必读书”这种方式确实有反感。在鲁迅看来,每个人读什么书是个人的自由,不必去指导什么,他说自己连自己的路怎么走都不知道,怎么能给你当导师。

你看胡适当时列出的书目,其实就是摆着学者的权威架子,鲁迅对这个是很反感的。那个时候更需要大家自由地阅读,自由地书写,前辈当然可以谈自己的经验,但是不要以自己的经验来代表国家民族、代表知识界的权威。鲁迅觉得自己收获最大的是读外国书,所以他就这么说了。

针对广大的社会青年群体,鲁迅不愿意去做导师;但是在私人语境,如果你要想研究中国传统文化,要做学者,他们可以介绍读几本入门书。

他没有去让许世瑛读四书五经,而是看那些

青年经历过生活,才能和鲁迅慢慢相逢

也有不再做这类小说的必要。”孙伏园此说得到鲁迅认可。鲁迅自己在《不是信》里说:“我也曾反对过将自己的小说采入教科书,怕的是教错了青年。”——《读+》注)

读+:在当下,这种“爱意”还有现实价值吗?我们该如何借鉴鲁迅对传统的态度?

孙郁:作为现代的知识人,我们如何看待古代的遗产?如果只见树木,没有森林,那认知大概是有所缺失的。所以,问题不是要不要继承传统,而是如何认识传统,以及怎样衔接传统有意义的部分。鲁迅对于国故的认识与别人不同之处,也恰是其思想生长之处。他的表达有许多颠覆之力,剥落了罩在旧文化遗产身上的层层光环。他对传统是择其善而用之,“从来如此,便对么?”他告诉我们,昨日如斯,今日如斯,明日当不该如斯,新文化要做的是古人未能做也不曾想做的另类事业。

这自然是相当难的,没有冲破牢笼的勇气,断不能改变旧有的面目。而新文化人竟然一步步走了过来,颠覆了以往的道路。“五四”一些新学人与新式作家,在汉语最为凝固的时期,激活了古老的文脉,他们不是葬送了传统,而是重新延续了中国旧的文化最为有活力的部分。读彼时的一些文章,会感到那时候的思想者不是以温

伟大的精神存在,就是矗立在风雨里

讨论人的个体价值,讨论到社会的文化形态的时候,经常会讲到鲁迅,站在不同的角度与鲁迅相逢。

20世纪80年代,在韩国,鲁迅是一个重要的精神资源,他影响了韩国一代知识分子,韩国人说“我们没有鲁迅”,很多精神领袖在监狱里面研究鲁迅。

我接待过日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,我让他参观鲁迅的藏书,他看完了以后特别惊讶,说鲁迅当时藏的德文书,都是德国知识界最关注的,而且现在看来也是弥足珍贵的一些文本。大江健三郎说他和现在的日本作家都无法跟鲁迅比,因为鲁迅精神隐含的内容十分丰富。大江健三郎在北大演讲和在鲁迅博物馆的谈话里面都谈到了这一点,说鲁迅是无法企及的。

世界各地研究鲁迅的人非常多,最让我感动的是琉球人。有一年,我去那里发现有一个鲁迅研究的群落。从1945年一直到今天,琉球的那些知识分子几乎都没有离开过鲁迅式的语境,他们用鲁迅式的智慧来面对美军的占领。当地有一个著名的美术馆叫欢喜真美术馆,展藏鲁迅介绍过的藏品,用鲁迅的精神资源来抵抗外来力量。他们的小说、诗歌、戏剧、绘画、表演里面,

情脉脉的方式面对身后的存在,而是以批判的目光重审旧的文明。带着沉重的忧思和痛感,剥掉了身上的伤痕,这是阵痛中的自审。鲁迅在面对旧的遗产时的批判意识,以及积极摄取精华而创造新文学的选择,成了民族文化史悲壮的一页。其实从孔夫子到王阳明,每个时代的思想者都是以批判的意识开始自己的精神之旅的。鲁迅那代人在“五四”前后的探索,是现代知识分子自我解放的一次疾走。现在我们说这些人孔子、老子、庄子、墨子一样,乃中华文明史永远伫立的路标,是确确实实的。

文化的发生它是按照惯性走了,我们祖先规定了这样的一种文化秩序以后,一代一代重复这样的秩序,有它的道理,也产生了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和思想家,但是它会遗漏很多东西。任何一种文明在发展过程当中它都会遗漏,都会有空白点。鲁迅是发现了我们文明里遗漏的东西,而且以此来丰富我们的精神。

鲁迅说过,“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,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,取今复古,别立新宗”,我们不落后于世界进步的大潮,但我们也不要失去我们固有的血脉,取法现在好的东西,回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辉煌的原点,重新出发创造出新的文明,这是鲁迅在100多年前提出的看法。我们的改革开放,正是“取今复古,别立新宗”。

依傍着鲁迅的传统,用鲁迅的意象反抗奴性,就是在所谓正确的地方看到问题,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。鲁迅的一些意象在他们那里成了核心力量所在。

我在美国分别参加过哥伦比亚大学与哈佛大学召开的鲁迅研讨会,发现世界文化史中的鲁迅的研究论文也多了起来。我相信,在中国百年作家与思想家中,鲁迅是被叙述最多的人,他必将成为文化史中难以绕过存在。

一个伟大的精神存在是不需要保卫的,他就是矗立在风雨里。在这个世界里,不断地会有一些新人与鲁迅相逢,这些人发出来的声音要比那些为了流量、为了赚钱的人的言论要伟大得多。这些人的声音是真正的人间的声音,阴暗里的声音不足为道。

为什么世界各地都在纪念、研究鲁迅?就是因为东亚的这个20世纪,只有他的思考表现了思想解放的亮度。当西方文化进入时,东方人该如何选择?鲁迅是忍着疼痛拷问自己,正视这个问题。他认为东方人要虚心学习,但同时又不能成为奴隶,这种姿态使他成为精神上的标本和象征。鲁迅表现了我们20世纪东方人思想最高的高度,超越了整个时代。